

汪辉祖《书〈金楼子〉后》略考

宋 亚 莉

内容摘要:清鲍廷博知不足斋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后,有清汪辉祖跋文《书〈金楼子〉后》,此则跋文多被研究者忽略。通过这则跋语,可以探讨清代藏书家、学者、文士的交接事迹,了解鲍本《金楼子》的由来与跋文中蕴含的藏书情结。

关键词:汪辉祖 《金楼子》 周书昌 鲍廷博

清鲍廷博知不足斋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后,有汪辉祖跋语《书〈金楼子〉后》(以下简称“汪跋”)。此则文献常为研究《金楼子》者所忽视,本文试从跋文入手,加以多方探析。汪跋内容如下:

呜呼!文字显晦之故,夫岂偶然也哉!往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,实介邵君二云、罗君台山。越二年丁酉,孙君迟舟入都,余又举以相属。己亥孟冬,余客吴兴,得迟舟书,则太史赠言,久托台山邮寄,而台山踪迹,渺不相知,浮沈之感,寤寐萦回。将裁书以询二云,会二云之族需葵至自长洲,言戊戌重九,二云北上,遇台山于吴门。台山出周太史贻余书轴,长尺有奇,厚几三寸,授二云转寄。需葵曾受其书,由武林寄余,而余未之得也。是夕遂治装至武林求之。历五旬又二日,而后得之于望江门外素不相识之人之手。盖二年以来,辗转付托,阅十有餘人。题缄之字已磨灭殆尽,不可辨识,而緘封且半敝矣。启而读之,不惟双节赠言无恙也,太史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录《金楼子》六卷,命致鲍君以文者,亦俨然在焉。贾逵以文,相与欣幸久之。夫需葵与余,并以衣食奔走,前此之不相见者几及十年。向非邂逅吴兴,余即再介二云求之,太史赠言尚可复得,而所谓《金楼子》者,势必渐就残佚。岁月愈深,人事递迁,其乌从而求之,又乌从而得之!说者谓余之乞言,斋心饮涕,先灵殆呵护之。顾余则以为太史表微阐幽之力,与以文拳拳稽古之心,实隐隐焉遥相契合。而《金楼子》之得以善本流布艺林,诚哉有数存焉!然则古今来文字之足以不朽者,其精神不可终闕,类如是矣。余闻台山归江右后,早游道山,今双节赠言得补登《集录》,而《金楼子》以文梓入《丛书》,岂惟需葵为能不负二云之托,抑台山有

知,亦且含笑地下也已。乾隆四十六年嘉平七日萧山汪辉祖跋。

此则跋文,提及清代颇富盛名的藏书家、学者、文士数人,他们因六卷本《金楼子》,互相托付,辗转奔波,读来令人感慨。跋文的作者汪辉祖(1730—1807),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。汪辉祖以藏书为好,先后所积书籍数万卷,收藏在环碧山房,有“萧山汪氏环碧山房珍藏印”。阮元《擘经室集·循吏汪辉祖传》载:

君姓汪名辉祖,字煥曾,号龙庄,晚号归庐。浙江萧山人。父楷,官河南淇县典史。娶方氏,无子。侧室徐,生君。方卒,继娶王。君生十一年而孤,王与徐抚且教,世称“汪氏两节母”。君才识开敏,年十七补县学生员,练习吏事,前后入诸州县幕,佐人为治,疑难纷淆,一览得要领。尤善治狱,平情静虑,侔境揣形,多所全活。以其暇读书,年三十九举于乡,又七年成进士。需次谒选,得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。^①

汪辉祖年十七即练习吏事,先后于闽浙两省 14 个州县幕府供职,因持正不阿为世所称,陈澧《东塾集》卷六载:“天下幕友多矣,其贤者当不乏人,而传于世者则少。其所为皆官事,其名归于官,而幕友遂湮没不彰也。近百年来惟萧山汪辉祖最有名。”^②绍兴师爷之名,正因汪辉祖而声名远播。汪辉祖所著,据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、《清续文献通考》、《国朝先正事略·汪龙庄大令事略》、《擘经室集》等载,有《元史本证》五十卷、《越女表微录》五卷^③、《环碧山房书目》一卷、《双节堂庸训》六卷、《学治臆说》二卷^④、《佐治药言》一卷续一卷、《双节堂赠言》三十卷^⑤、《史姓韵编》六十四卷、《九史同姓名略》七十二卷补遗一卷^⑥、《辽金元三史同名录》四十卷、《二十四史同姓名录》百六十卷、《读史掌录》十二卷、《龙庄四六稿》二卷、《楚中杂咏》四卷、《归庐晚稿》六卷、《辛辛草》四卷、《岫出初笔》二卷、《汪氏追远录》八卷、《过眼录》二卷、《治

①阮元:《擘经室集》第二集卷三《循吏汪辉祖传》,《四部丛刊》景清道光本。汪辉祖自著《病榻梦痕录》载:“四十年乙未,四十六岁正月赴礼部会试……(四月)二十一日殿试,二十五日胪唱第二甲二十八名赐进士出身。”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六十四载:“汪辉祖,字龙庄,浙江萧山人……乾隆二十一年,成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。”《清史稿》将其字与号混淆,成进士年份亦错,所载不确于此可见。

②陈澧:《东塾集》卷六《山阴汪君墓表》,清光绪十八年(1892)菊坡精舍刻本。

③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《越女表微录》五卷;《国朝先正事略·汪龙庄大令事略》、《擘经室集》作七卷。

④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《学治臆说》二卷;《国朝先正事略·汪龙庄大令事略》、《擘经室集》作四卷。

⑤此书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十九称《双节堂赠言录》,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三称《双节堂赠言集》,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称《双节堂赠言》三十卷,汪辉祖自著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上言“《双节堂赠言集》二十八卷附录一卷”,卷下言“《双节堂赠言续集》二十二卷”。

⑥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《九史同姓名略》七十二卷补遗一卷;《书目答问》做补遗四卷。

谷燕谈》三卷等约 28 种。

—

上引汪跋中,汪辉祖三次言辞恳切地提及双节赠言,先是“往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”,又言“不惟双节赠言无恙也”,最后说“今双节赠言得补登《集录》”,双节赠言如线索般贯穿《书〈金楼子〉后》全文,是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在当世名士间辗转托付的契机。汪跋所提及的双节赠言,乃汪辉祖为缅怀二母而集的《双节堂赠言》。汪之继母王、生母徐,教之成立,二母逝后,汪辉祖拜托当世名士为二母作传、诔、铭、赋、诗,亲力编纂《双节堂赠言》缅怀二母^①。汪辉祖所著《病榻梦痕录》载其求当世名士文情状:“盖自乙酉乞言以来,面求者无论四方仁人君子,闻名而不相识者,多恳二三知交辗转征乞,稟启稠叠,至再至三,或至八九,不得不止。垂三十年,不啻万有余函,群公答札及钩存墨迹并未上石者,裒成五十三册九轴,什袭珍藏以念后人。”^②汪辉祖乞文于当时名士,不相识者则托付好友,征乞乃至八九次,直至得到赠言为止,其用心之诚可见一斑。汪辉祖历经多年聚积千数百篇有关二母的诗赋铭诔,终成《双节堂赠言》,也是其与当时名士结交、交流思想、积聚藏书的历程,六卷本《金楼子》正是汪辉祖欲求双节诗于周书昌的契机下,得以传至其手,是当时名士交往的重要见证。

从汪跋中,我们大略知道汪辉祖的交际过程。汪欲求双节赠言于周书昌:“往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”;经孙迟舟处,知周托给罗台山:“太史赠言,久托台山邮寄”;罗联系不得:“台山踪迹,渺不相知”;汪欲问信邵二云:“将裁书以询二云”;从邵需葵处知,罗已转给邵:“台山出周太史贻余书轴,长尺有奇,厚几三寸,授二云转寄”;邵需葵经手自武林寄:“需葵曾受其书,由武林寄余,而余未之得也”;汪在武林得书:“得之于望江门外素不相识之人之手”;汪交付鲍廷博:“赍达以文,相与忻幸久之”。也就是说,六卷本《金楼子》,以汪辉祖乞双节赠言于周书昌为契机,经周书昌-罗台山-邵二云-邵需葵-素不相识之人-汪辉祖-鲍廷博等,辗转数人。

由此可深入探讨汪辉祖与这些名士的相识情况。先看汪与邵、罗。汪辉祖向周书昌求赠二母双节诗,“实介邵君二云、罗君台山”,可知汪与此二人先于周书昌相识。二人之中,汪先与邵结交。邵晋涵(1743-1796),字与桐,号二云,又号南江,浙江余姚人,清史学家、经学家、校刊学家。乾隆三十六年进士,历任

①二母双节诗,康熙年间已有。清张景星等所编《晚晴簃诗汇》,卷九载王吉臣向博尔都索要《双节诗》。诗句中言曰:“王生二母朱与李,一井相逢誓生死。金石同心甘下人,呜呼忠节成连理。”与汪氏此意同。

②汪辉祖: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下,清光绪十二年刻本,山东书局,第56页。3册1函,10行24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左右双边,单鱼尾,板框18×13.7cm。

翰林院侍读,入四库全书馆。汪与邵的相识,在乾隆三十二年(1767)。据《病榻梦痕录》所载:“(乾隆)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岁……是年交余姚邵二云晋涵。二云经术淹通,于书无所不读,为人孝友诚和。”^①汪辉祖尝经邵二云向当世名士乞双节赠言,《病榻梦痕录》载:“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岁……是年介邵二云乞江西新城鲁君絜非仕骥撰双节文字。”罗台山也是汪辉祖经邵二云所认识并乞文的名士之一。汪辉祖《双节堂庸训·亡友》篇载:

罗台山(有高),江西瑞金人。乾隆乙酉举人。己丑会试,以邵二云(晋涵)先容,得订交焉。又七年,余佐慈溪知县黄补畲(元炜)幕中,台山方主鄞县。邵双桥(洪)家近以来,共晨夕者二旬。奉《双节堂赠言》,丐为论定。越二年,叙别于钱塘寓舍。凡《赠言》中古文,一一次第点正。通《内典》,尝进余以摄生之道,余未之能行也。而台山以己亥正月卒于家。^②

罗台山(1733-1779),清代理学家,有《尊闻居士集》传世。据上文“以邵二云(晋涵)先容”知,经由邵二云的褒扬介绍,汪辉祖与罗台山在乾隆三十四年(1769)会试时订交。此后,逐渐深交,罗台山在鄞县做县令之时,二人在邵双桥家会面,议论点定文稿《双节赠言》。罗台山精通佛经,传授汪辉祖养生之道。邵二云向罗台山引荐汪辉祖的情形,罗在为汪所撰的《萧山汪氏两节妇传》中如此叙述:“辉祖举于乡之明年,是为祝犁赤奋若之岁。余至京师,余姚邵二云为余言汪孝子辉祖事,未尝不正襟沉吟太息也。及余得见汪孝子,辄絮絮述其两母孺人,贞苦节植汪氏祀屯难中,反复不厌求为两母立传。”^③可知相识之缘也因二母立传事。罗有高其人颇具传奇,《耳食录》“罗台山”条载:“罗台山有高,江右人,尝察孝廉,不汲汲仕进。抗志读书,以博雅闻海内。能拳勇,善击剑,风流雋爽,殊有奇气,好购买古器、鼎彝、权律之属,充列几案。又好蓄奇石,有奇章南宮之癖。数千里外,辄独行无仆从。”^④汪辉祖《书〈金楼子〉后》中所言“而台山踪迹,渺不相知,浮沈之感,寤寐萦回”,亦暗含其行迹无定。由此可知,汪辉祖先交邵二云,又经邵结识罗台山,再由此二人与周书昌相识。再看汪、邵、周三人之交。汪跋所言“周太史书仓”,即周书昌^⑤。《碑传集》卷五十桂馥所撰“周先生永年”条载:

周先生永年,字书昌,济南历城人。结茅林汲泉侧,因称林汲山人。先生于衣服、饮食、声色、玩好一不问,但喜买书。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,得书辄归先生。凡积五万卷,先生见收藏家易散,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,作

①汪辉祖: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上,第二十九页,清光绪十二年刻本。

②汪辉祖著,王宗志等注释:《双节堂庸训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228页。

③吴翌凤:《清朝文征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1410页。

④乐钧、许仲元:《耳食录》二编卷一“罗台山”条,重庆出版社,1996年,第122页。

⑤周永年,字书昌,又有如汪辉祖《书〈金楼子〉后》称周书仓,本文依《碑传集》卷五十桂馥文称“周书昌”。

《儒藏说》……后成进士，欲入山治《仪礼》，被征纂修四库书，授翰林院编修、文渊阁校理。当是时，海内学人集辇下，皆欲纳交，投刺踵门，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晋芳、归安丁杰、余姚邵晋涵数人而已。^①

周书昌(1730-1791)，济南历城人，以藏书为最大嗜好，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之时为子部纂修官，一时名重海内，学人皆欲纳交投刺，然其深交者仅数人，余姚邵晋涵即为数不多之一，邵二云为经部纂修官，二人因四库全书而“深相知”。此时汪辉祖与邵二云已然相识，汪或经邵向周求赠言。周书昌与罗有高二人是相识的，罗有高有《书历城周君私谥益都李叔子议后》文，其文载：“叔子之友历城周君永年，私制谥曰孝悼，述议以章之。予闻周君治古礼文精洽，其制谥焉，其必有处焉，其非徇未造之俗，苟以美名振叔子以为文，而施叔子以其所不安。而余深考其义，类以比切叔子平生师古之心，则子窃恐未必其概亏叔子之心，而益以伤叔子之心，是不可以无论者也。”^②既称周君，二人则认识；然其文对周永年私谥友人孝悼一事公开批评，则似乎说明周、罗二人并非深交挚友。汪辉祖所托之人，又有孙迟舟。孙迟舟与汪辉祖为莫逆之交。《双节堂庸训·亡友》载：

孙迟舟(辰东)，初名宸。归安人。乾隆壬辰举礼部试第一；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。官翰林院编修。先是岁丙戌，迟舟方持父服，课平湖知县刘冰斋(国烜)二子学，余治申韩家言，佐平湖幕，称莫逆交。甲午丁内艰，主讲东阳书院，余客海宁，屡寄文字商正。丙申，余再馆平湖，迟舟服阙，过余叙别。明年，迟舟举男，余举女。因有婚姻之订，是为庚子之春。其后秋分，校顺天乡试，卒于闾中。^③

汪辉祖与孙迟舟的相识，在汪任平湖幕府之时，二人不仅商撮文字，更有儿女婚姻之约，交往极深。六卷本《金楼子》最后送至鲍以文之手，汪、鲍二人关系密切。跋文所言“鲍君以文”，即鲍廷博(1728-1814)，字以文，号淶饮^④，祖籍安徽歙县长塘，后随父鲍思诩居杭州。鲍廷博精于校勘、版本、目录之学，筑室藏书，取《礼记》“学而后知不足”之意，为“知不足斋”，其所藏之书，多为宋元古槧暨善写本。汪辉祖与鲍廷博于乾隆四十二年(1777)相识，据《病榻梦痕录》载：“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岁……是年交歙县鲍以文。廷博以文诸生，博通典籍，为人醇雅有气谊，世所称知不足斋主人者也。”^⑤可知汪对鲍很是欣

①钱仪吉：《清碑传全集》卷五十桂馥作《周先生永年传》，上海书店，1998年版，第652页。

②罗有高：《尊闻居士集》卷五《书历城周君私谥益都李叔子议后》，清光绪七年刻本。

③汪辉祖著，王宗志等注：《双节堂庸训》，第228页。

④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百二十五载：“鲍廷博，字以文，一字淶饮”；丁绍仪《国朝词综补》卷二十九载“鲍廷博字以文，号淶饮”；李榕《杭州府志》卷一百七十载“鲍廷博，字淶饮”。说法各不同。

⑤汪辉祖：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上，第三十九页，清光绪十二年刻本。

赏,二人相识之后,直至晚年仍有诗文往来。《病榻梦痕录》有载:“五十年乙巳五十六岁……撰《佐治药言》二卷,鲍以文刻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十二集”^①;“嘉庆元年丙辰六十七岁……属鲍以文转致填望海潮一阙,题丁昂若观潮图小照,皆口授。”^②交谊之深厚可见。

二

汪跋载,开启缄封,“太史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录《金楼子》六卷,命致鲍君以文者,亦俨然在焉”。可知周书昌一开始真正想寄付《金楼子》于鲍廷博而非汪辉祖,即《金楼子》六卷本出发点和终点的两个人是周书昌和鲍廷博,汪辉祖乞双节诗和鲍廷博求六卷本《金楼子》于周书昌或是两件事,但因汪辉祖乞双节赠言和彼此友人的互相信任,以及当时名士与四库全书的诸多联系,使得汪辉祖最终经手六卷本《金楼子》。六卷本《金楼子》,展示了周书昌、邵二云之外,鲍廷博、汪辉祖等名士与四库全书的渊源。

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自乾隆三十七年(1772)始,至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前后修成。汪跋文中“越二年丁酉”,嘱入京之孙迟舟询问双节诗事,在乾隆四十二年(1777);而“己亥孟冬”,汪氏客吴兴,从孙迟舟信中得知赠言已“久托台山邮寄”,已是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正值《四库全书》紧张编纂之际。子部的负责人周书昌、史部的负责人邵二云等人于乾隆三十八年七月被特旨荐入四库馆,为四库全书之编纂竭尽全力。清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”条载纪昀言:“《总目》虽纪文达、陆耳山总其成,然经部之属戴东原,史部之属邵南江,子部之属周书仓,皆各集所长。书昌于子,盖极毕生之力。”^③乾隆三十八年,正是鲍廷博献书之时。鲍廷博对《四库全书》子部有献书之大功,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二《鲍廷博传》载:“乾隆三十八年,四库馆开,廷博命长子士恭进家藏善本六百余种,大半宋元旧板写本,又手自校讎,为天下献书之冠。”^④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朝廷诏求天下遗书,共收书3503种,鲍廷博长子鲍士恭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,内多为宋元以来之孤本、善本^⑤。朝廷最终选250种入《四库全书》,129种著录在《四库全书存目》。乾隆三十九年,鲍廷博大受朝廷褒奖,赏赐了内府编纂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。乾隆四十年归还其原书,乾隆皇帝赐其题诗曰:“知不足斋奚不足,渴于书籍是贤乎。长编大部都皮

①汪辉祖: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上,第四十八页,清光绪十二年刻本。

②汪辉祖: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下,第七十页,清光绪十二年刻本。

③李慈铭: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上海书店,2000年,第556页。

④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二《鲍廷博传》,中华书局,1987年版,第5930页。

⑤乾隆三十八年(1773)浙江巡抚三宝的《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现遗书等事摺》中言“除寻常习见及互有重复各书不列外,计鲍士恭家有六百二十六种”。《四库采进书目》著录鲍士恭进书目时,题为《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计共六百二十六种》。

阁,小说卮言亦入厨。”当时士林皆称羡“千载稽古之士未有荣遇如斯者”^①。鲍廷博因此深受鼓舞,立志刊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。鲍廷博所献之书,以子部最多。据统计,从《四库总目》查找题名为“鲍士恭家藏本”的图书,鲍廷博所呈有经部3种,史部12种,子部74种,集部2种^②。这一点,不仅说明鲍廷博可能因子部献书事与周书昌联系增多,也证明鲍廷博对子部书籍尤其关注。此外,周书昌、邵二云等入馆后均充校勘《永乐大典》纂修兼分校官,负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并编辑学术价值较高的佚籍入《四库全书》,而二人皆从中多抄录副本传出。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就是周永年抄录之一^③。桂馥《周永年先生传》载:“(周书昌尝)借馆上书,属予为《四部考》,佣书工十人,日钞数十纸,盛夏烧灯校治,会禁借官书,遂罢。”^④《金楼子》应就在“禁借官书”之前,至少在乾隆四十四年以前,已由周书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,并双节赠言托罗台山寄出,流入民间^⑤。

《金楼子》能够同时被周书昌和鲍廷博所重视,尤其被鲍廷博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,则由《金楼子》一书的特点而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载:

又《永乐大典》詮次无法,割裂破碎,有非一篇而误合者,有割缀别卷而本篇反遗之者。其篇端序述,亦惟《戒子》、《后妃》、《捷对》、《志怪》四篇尚存,余皆脱逸。然中间《兴王》、《戒子》、《聚书》、《说蕃》、《立言》、《著书》、《捷对》、《志怪》八篇,皆首尾完整。其他文虽搀乱,而幸其条目分明,尚可排比成帙。^⑥

《金楼子》自《永乐大典》辑出,次序混乱,篇章遗失,仅有四篇完整保存,

①李榕《(民国)杭州府志》卷一百七十载:“鲍廷博字涑饮,安徽歙县诸生……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,采访遗书。廷博命子仁和监生士恭,进其家藏书六百余种。既著录,复还原书。《内唐阙史》及《武经总要》御制诗题之。赐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伊犁得胜图金川图》。又多刻所藏古书善本,成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。嘉庆十八年,巡抚方受畴,以廷博续刊书进赏给举人,卒年八十六。”

②此统计见付嘉豪:《鲍廷博与〈四库全书〉》,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》2011年第6期。

③周永年所抄出书,还有《斜川集》,今藏台湾“国家”图书馆。台湾“国家”图书馆所藏周氏林汲山房钞本《斜川集》,内有邓邦述跋:“林汲为山东周书昌先生斋名,于邵二云同在史馆,同辑《永乐大典》,一时竞写未见之书。”四库馆私家抄校书情况,可见杨洪升:《四库馆私家抄校书略考》,《文献》2013第1期。

④钱仪吉:《清碑传全集》卷五十桂馥作《周先生永年传》,上海书店,1998年,第652页。

⑤鲍本和四库本皆为元至正间刊本,或为周书昌所辑,不少研究者给予肯定,如钟仕伦先生的《〈金楼子〉研究》(四川大学博士论文,2002年)和刘洪波先生的《〈金楼子〉的版本系统》,《北华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4期)中也给予肯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十七子部二十七《金楼子》提要云:“今检《永乐大典》各韵,尚颇载其遗文。核其所据,乃元至正间刊本”;鲍本序言有“至正三年癸未岁春二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”,皆可说明此问题。

⑥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569页。

八篇掺入他文,然此情况正在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编选之列。鲍氏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凡例:“仅有传抄而无刻本者,有时贤先辈撰著脱稿而未流传行世者,有刻本行世久远、旧版散亡者,有诸家丛书编刻而讹误脱略、未经人勘正者,始为择取校正入集”^①。《金楼子》不仅是学术价值更高的佚集,更是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所编选的书类,这是其为鲍廷博、周书昌二人推重并传抄的原因。而《病榻梦痕录》所载汪辉祖与鲍廷博相识的乾隆四十二年,正是汪跋文中“越二年丁酉”,嘱入京的孙迟舟询问双节诗事之年;汪辉祖得周书昌双节赠言外,也收到将六卷本《金楼子》“致鲍君以文”的嘱托,说明周书昌已知汪、鲍相识。汪跋的撰写,既说明了汪辉祖与六卷本《金楼子》缘分,也佐证了汪辉祖与鲍廷博的深厚交往,汪、鲍二人不仅互写题跋(如汪辉祖《续佐治药言》乃鲍廷博所撰),这种文士间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二人晚年。汪辉祖七十四岁之时,尚与鲍廷博通信,《病榻梦痕录·余》载“(嘉庆)八年癸亥七十四岁……二十日得鲍以文书,书曰:‘屡欲东渡,常被病牵,怅怅无已。’”^②

当然,汪辉祖能够经手六卷本《金楼子》,也非偶然。汪辉祖不仅与跋文中提及的邵二云、周书昌、鲍廷博交好,汪辉祖的好友,不少也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编纂。《双节堂庸训·亡友》载:“张潜亭(羲年),余姚人。乾隆乙酉拔贡生,官于潜,训导俸满,保举以知县用,请留四库馆效力,赐国子监助教衔,充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。”^③这说明,汪辉祖与当时《四库全书》的不少编纂者为友。汪辉祖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上载:“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岁……是岁间,日必作一艺,时来江皋授徒,里门孙迟舟主东阳书院讲席,一艺成必分书两篇,寄二君评阅。或不惬,遂改作,至有三四易稿者,撰策拾十卷手录,至除夕昏定方毕。交余姚张潜亭羲。”^④可知,张潜亭、孙迟舟与汪辉祖乃好友,常书信往来切磋文稿,张潜亭很可能是跋文中受汪辉祖所托的孙迟舟入京问询的友人之一。

三

此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得到周书昌、鲍廷博、汪辉祖等清代文士的推重,汪跋中,其珍视之情溢于言表:“向非邂逅(邵需葵于)吴兴,余即再介二云求之,太史赠言尚可复得,而所谓《金楼子》者,势必渐就残佚。岁月愈深,人事递迁,其乌从而求之,又乌从而得之!”与所求赠言相比,汪辉祖认为《金楼子》更为重要。倘若没有遇到需葵,《金楼子》可能会残佚,对六卷本《金楼子》的珍视不言而喻;汪跋文还言,最终“双节赠言得补登《集录》,而《金楼子》以文梓入《丛书》”,表达了其与周书昌交接的两件事情如愿实现的庆幸与感念心态。

①刘尚恒:《鲍廷博年谱》卷二,黄山书社,2010年,第79页。

②汪辉祖:《病榻梦痕录·余》,第六十六页,光绪十二年刻本。

③汪辉祖著,王宗志等注释,《双节堂庸训》,第229页。

④汪辉祖: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上,第三十六页,光绪十二年刻本。

六卷本《金楼子》自周书昌辗转而至鲍廷博,经仁和朱文藻、海宁吴騫等学者和藏书家的多次校订,终在乾隆五十一年(1786),刻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^①,得以流布艺林,从汪跋中,我们看到了清代文士藏书、聚书背后包含的热忱与天下公心。汪氏开篇深有感触,“呜呼!文字显晦之故,夫岂偶然也哉!”点明《金楼子》能够善本流传,绝非偶然,而是一批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使然;进而谈及,书与赠言一直未得,“台山踪迹,渺不相知,浮沈之感,寤寐萦回”,牵挂友人并所托之书、赠言,其真诚之心,历历可见;待得到保存完好的书、赠言并致鲍君书,更是与鲍廷博“相与欣幸久之”,欢跃欣喜之情如跃纸上;而更令人动容唏嘘的是,“《金楼子》以文粹入《丛书》,岂惟需葵为能不负二云之托,抑台山有知,亦且含笑地下也已”。跋文完成之际,为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奔波尽力之罗台山已经仙逝。呵护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在辗转流离之中得以完善保存的,不仅有汪辉祖、邵二云、罗台山、周书昌、邵需葵、鲍以文等跋文所载名人;更有诸如“望江门外素不相识之人”给予帮助;还有跋文记载之外,与此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刊刻相关的吴文藻、吴騫等人。而更为本质的,使得六卷本《金楼子》得以保存的,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珍视善本典籍的历史心态与文化精神。秦火焚书,已有孔壁藏书,《史记》卷十五《六国志第三》载:“秦既得意,烧天下诗书……诗书所以复见者,多藏人家。”珍视典籍之传统久以有之。历代藏书之拳拳之心,使得典籍文献历经磨难,亦能常得完善保存。汪氏所言,“说者谓余之乞言,斋心饮涕,先灵殆呵护之。顾余则以为太史表微阐幽之力,与以文拳拳稽古之心,实隐隐焉遥相契合。”正是这斋心饮涕之孝心,拳拳稽古之真心,殷殷爱书之深情,使得《金楼子》最终得以流传。同是聚书,藏书,《金楼子》的作者梁元帝萧绎,虽以聚书、藏书闻名,却未有珍视典籍之心。《金楼子·聚书》载:“吾今年四十六岁,自聚书来四十年,得书八万卷,河间之侔汉室,颇谓过之矣。”然所聚之书,于其兵败之日,付之一炬,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六十五载:“帝入东阁竹殿,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,将自赴火,宫人左右共止之。又以宝剑斫柱令折,叹曰:‘文武之道,今夜尽矣!’”这不仅仅是学者、文士与政治家对待文化的心态迥然所致,更是藏书家的心胸、眼界的天壤之别。《金楼子》能在萧绎焚书之后,得以侥幸留存,是历代藏书家和文士的珍善所致,正如汪跋所言,“然则古今来文字之足以不朽者,其精神不可终闕,类如是矣。”正是这代代不可终闕的精神,使得《金楼子》留存至今。

【作者简介】宋亚莉,女,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论、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^①今国家图书馆存吴騫《金楼子》校勘记手稿本二种,钤有吴騫、愚谷印二枚,讹误补遗近百条。其整理情况可参考陈志平:《论鲍廷博、吴騫对〈金楼子〉的整理》,《兰台世界》2012年第4期。